

 四川客家文化丛书

# 老客部与新移民

陈世松 著



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编印

2004年1月



四川客家文化丛书

# 老成都与新移民

陈世松 著

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编印  
2004年1月

# 四川客家文化丛书编辑部

---

主 编

刘义章（特邀）

陈世松（执行）

副主编

邓运佳

李全中

# 总 序

当今之世，经济全球化热浪铺天盖地，文化多元格局不可避免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客家文化，正以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姿态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为载体，以客家亲情联谊为纽带，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连接在一起，使客家文化成为通向世界的桥梁。通过搭建客家学术研讨会的平台，把客家文化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为推进社会经济进步增添了新的助力，一时间客家研究蔚为显学。

当前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客家文化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。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弘扬客家文化，继承和发扬客家精神，为推进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客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。如何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，尽可能地调适二者之间的矛盾，使客家文化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，在适应中得到保存与升华。这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，又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。

客家文化（乃至中华文化）怎样在全球化浪潮中自珍自存、屹立不倒，并且与时俱进，取决于其能否去芜存菁，发扬自身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。果能如此，当客家文化作为“本土文化”与全球化浪潮相遇时，才不致被冲倒，而反过来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，从而为文化多元格局作出贡献。

为了探索在当前形势下抢救、保护、发掘、开发客家文化资源的经验与途径，我们需要对自身的客家文化资源家底进行一番盘点和研究。完成此项工作，不应仅仅停留在书斋之中，恰恰相反，更应该让客家文化走出书斋、走向社会，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。

此前，我们曾经公开出版过一套“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”，主要面向具有一定研究兴趣和基础的读者，但适应面稍窄，仍未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当前社会亟需介绍客家文化知识的精神食粮，但由于主、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一时难以如愿。出于学界的责任，我们只好以内部资料的形式，推出这套“四川客家文化丛书”，以应此急。如果说前套丛书属提高型，这套丛书就是普及型。两套丛书在推广客家文化知识上，犹如两个车轮，并行不悖。

本套丛书由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策划、编印。选题从普及客家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，注重知识性、趣味性和可读性，每种书篇幅不长，力求通俗易懂、雅俗共赏，并且图文并茂、开本考究，便于携带。丛书统一规划，分批次第推出，待编印到一定数量后，再汇集成套，统一装帧，以此作为向2005年在四川举行的“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”献礼。

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刘义章  
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 陈世松

2003年12月31日

# 目 录

## 总序

- 一、老成都难寻踪..... 1
- 二、破碎的绿洲与开放的特区..... 6
- 三、滚滚移民潮.....11
- 四、新老移民先来后到（上）.....15
- 五、新老移民先来后到（下）.....19
- 六、拓荒者·播火人.....23
- 七、平民文化的崛起（上）.....28
- 八、平民文化的崛起（下）.....32
- 九、民俗方言大荟萃.....37
- 十、民族性格大矫正.....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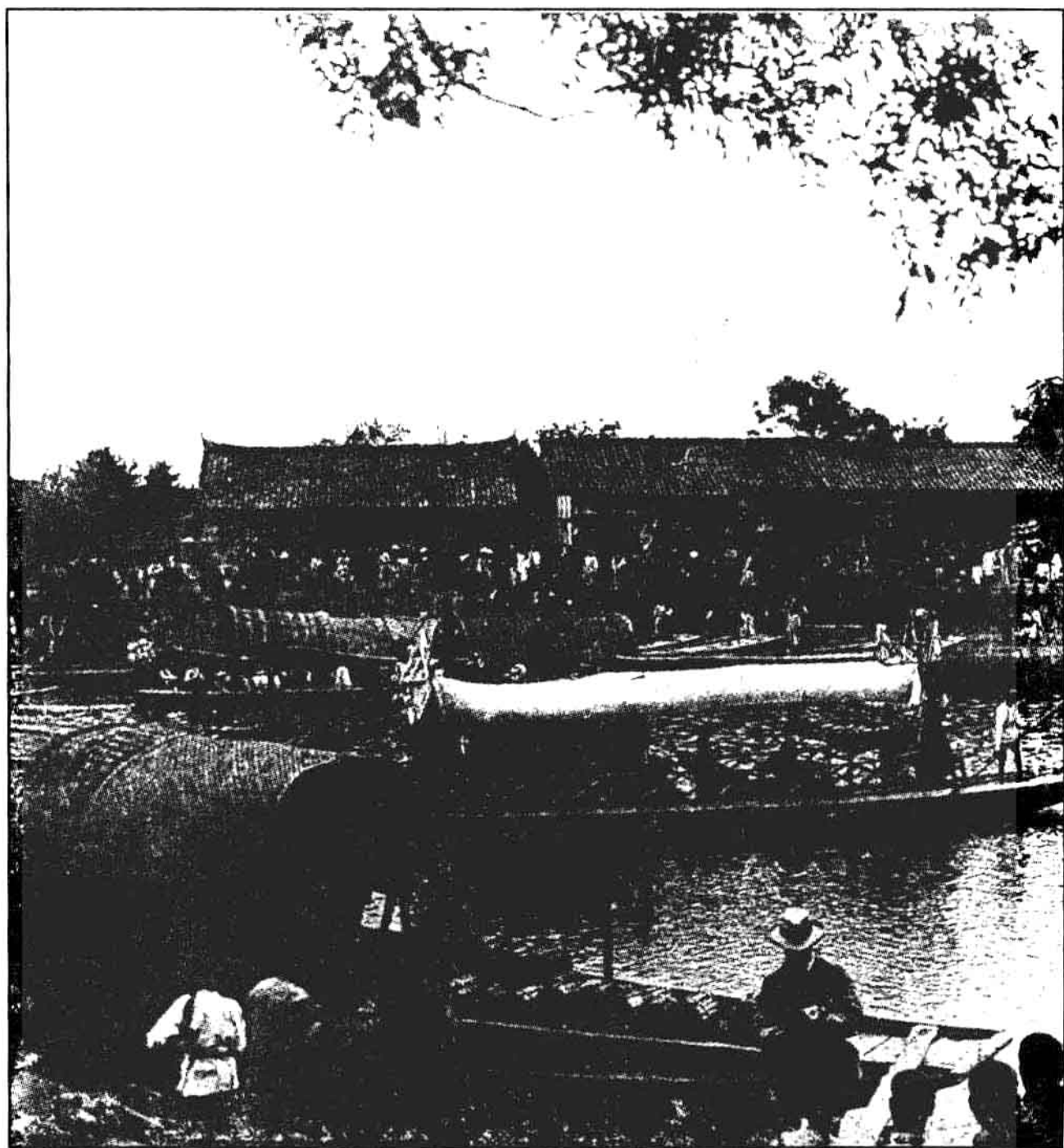
## [附录]

- 成都人的祖先来自何方？.....47

四川是全国的人口大省，可是自元明以来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四川人。关于成都人、四川人的祖先来自何方的问题，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。这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，又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。自《成都晚报》1991年5月4日《老成都》第1期刊登署名卢杨村的文章《成都人的祖先来自何方？》（见本书附录）以来，学术界又有不少新成果问世。寻根问祖，恋乡思亲。梳理这一问题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，综述成都人、四川人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创业过程，有助于全面理解成都和四川的人文环境，正确认识成都人和四川人的个性特点，增强人们对故土的热爱与凝聚力，这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，不无参考借鉴作用。



成都少城 [德] 魏司 摄于1908年



锦江码头 [德] 魏司 摄于1907年

## 一、老成都难寻踪

我们居住和生活的这座美丽而古老的现代都市——成都，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；而与这座老资格的古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，成都人的祖先却大都是近几百年前才从外省迁徙而来的移民后裔。这样的特点，恐怕在全国各大城市中，也是不可多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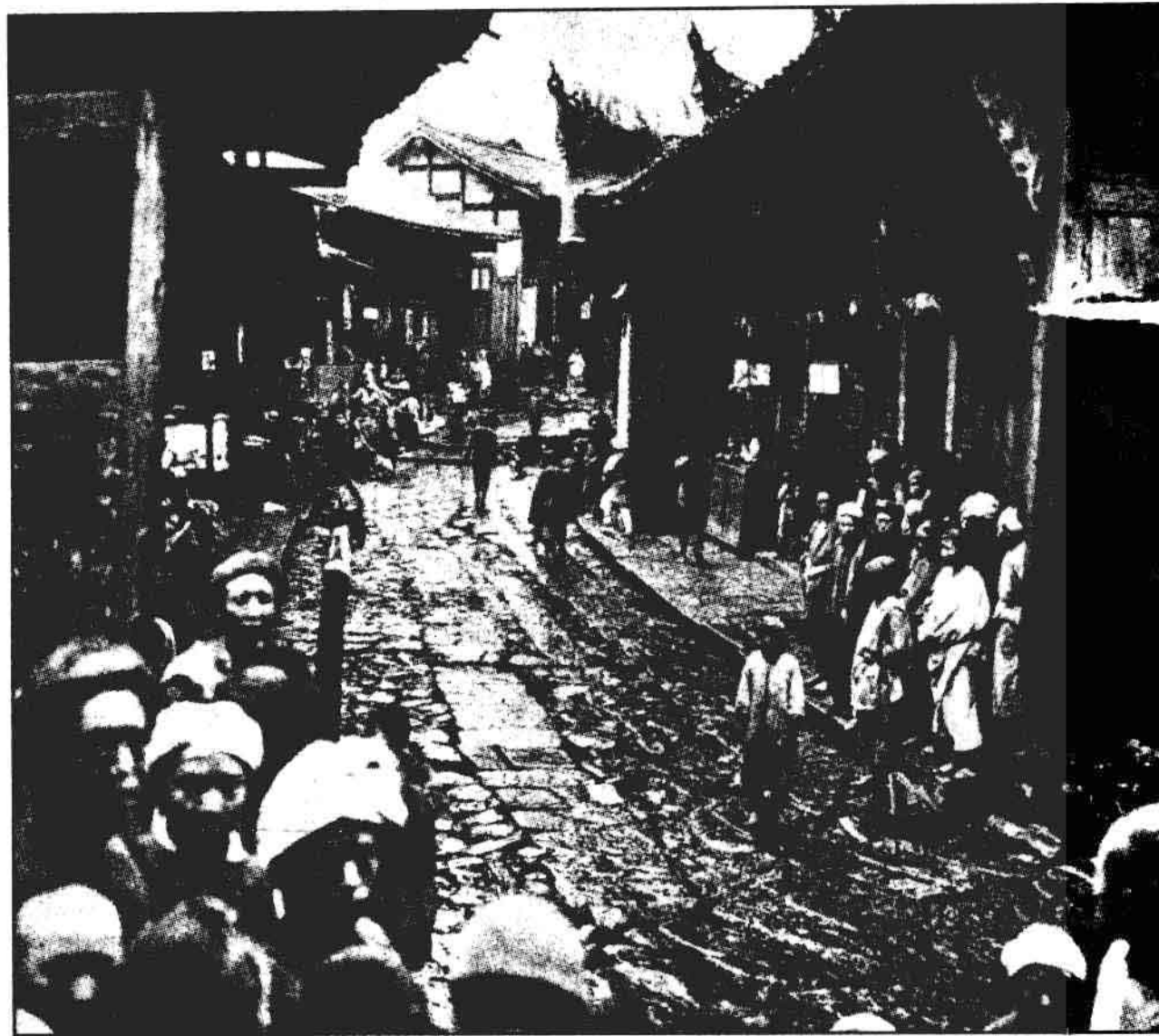
人口与社会变迁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热点之一。现有学术成果表明，长江中下游的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等省人的祖先，均能上溯到唐宋五代，乃至东汉两晋、南北朝，起码有千年以上的历史。而现在成都人、四川人的祖先，他们虽被称之为“老成都”、“老四川”，其实大都不过是近几百年前来自外省的移民。民国《资中县志》说：“资无六百年以上土著，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，闽赣粤籍大都清代迁来。”应该说，成都人、四川人的由来，和资中县的情况大体相似。

成都人的祖先为什么最早只能上溯到明代，而不能像江南各省那样上溯到明代以前呢？

众所周知，上古的巴人和蜀人，可称为纯粹意义上的四川人。秦汉以后的四川人，盖即巴蜀民族的后裔，其间虽有中原人和南方民族迁入，但多融合于其中。晋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列有先汉以来巴蜀士女203人的目录，这些人都是当时成都和巴蜀有名的望族。到了宋代，成都人还被称为“老蜀都”。宋仁宗时四川进士张及，就赠诗给一个叫杜鼎升的老先生说：“家本樊川老蜀都，世家冠剑岂寒儒。笔耕尚可储三载，酒战犹能敌百夫。”杜鼎升家住在成都双流县东的樊川，据《蜀王本纪》记载，蜀王本治广都之樊乡，因此宋人称其人为“老蜀都”。像这样的“老蜀都”大姓家

族，在宋代就有几十家（见元人费著撰写的《氏族谱》）。

但是，宋以后，即经过一场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50年的宋元战争后，这些大姓家族就所剩无几了。在费著《氏族谱》中所列的四川45个大的氏族中，到了元代，仅有3个能肯定查到线索，其他或因全部分散而失去与四川的关系，或因战争而灭绝了，或因失踪于布衣之间。另据元人揭傒斯在一篇题为《彭州学记》的文章中写道：“国朝（元朝）用兵积数十年，（四川）乃克有定。土著之姓十亡七八，五方之俗更为宾主。”在元代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居民或不复忆其祖宗所自来，乃有



洛带古镇 [德] 魏司 摄于1909年

以土著称者。经过宋元战争，四川人中约有70%—80%的土著民毁灭了，劫后余生的20%—30%的土著民，如宋人所说：又皆“命脉垂绝，形神俱离，仅存一缕之气息而矣。”其后，再经过元末和明末的两次社会大动荡，宋元以来的土著就此灰飞烟灭了。所以，被后代来称为“老成都”、“老四川”的，其实已不是指宋元以前早已消亡了的纯粹意义上的四川土著民，而是指明以后入川的外省移民。1804年刊行的六对山人的《锦城竹枝词》说：“大姨家陕二姨苏，大嫂江西二嫂湖。戚友初逢问原籍，现无十世老成都。”如以平均20年为一世（即一代人）计算，十世不过上溯200年，即当明末。可见，在清前期就已见不到明末的“老成都”，更不要说去寻找明代以前四川土著的踪迹了！



成都的会馆 [德] 魏司 摄于1908年

## 二、破碎的绿州与开放的特区

四川盆地由于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，经济又能自给自足，所以，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全国乱中的一块绿洲。但在清初，它却出现了一幅人口大量耗损，田土荒芜，经济残破，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画。

清初成都的残破，是由明末以来长期的战以及连年的灾荒引起的。自明末天启元年（162

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攻围成都以来，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五次入川，并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。此后，便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战争：有大西军余部抗清、大西军余部与残明军的抗争、残明军抗清，以及清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等。当时各种武装势力，无不围绕成都进行争战。这是继宋元战争之后，又一场断断续续进行了50多年的战争。由此造成川西平原人口大量死亡，虽不能称“靡有孑遗”，但也是残存不多了。过去地主阶级把责任完全推给张献忠，污蔑是张献忠杀尽川人造成的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。

与历史上和平安定条件下，成都平原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形成鲜明对比，《蜀破镜》载：清初“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”。民国《温江县志》载，县境“劫灰之余，仅存者范氏、陈氏、卫氏、蒋氏、鄢氏、胡氏而矣。”顺治十六年(1659年)清查户口，该县仅有32户，男31丁，女23口，“榛榛莽莽，如天地初辟。”民国《郫县志》也说：“邑自前明兵燹后，仅遗七姓，即孙、唐、苟、范、徐、马、刘是也。”民国《双流县志》估计，境内“人民存者十之一”。另据一位自湖北迁至双流的移民刘汝钦说，他幼年时，其家老屋外，草坝一望，弥莽中有虎豹，父老禁勿近游。新宅后，田中有一尺长的鲤鱼僵死，无人捕捉。当时田广人稀，每年秋天，谷子已经成熟黄落，还来不及收

获。不得已，只好将谷子割了堆积在田内，上面盖上草，等待慢慢移进屋里，直到冬初才完事。

城郊尚且如此，市区更是一派萧索。据同治《成都县志》载，清顺治十七年(1660年)巡抚及司道官入成都。见城中自张献忠离去后，已经13年断绝人迹。到处是“狐兔纵横，树木丛杂。凡市廛闾巷居址，一切不可复识。……兵士猎豺虎熊豹，日不暇给。……城中旧井二万，存者二百有奇。或人或金(实之)，无异平地。老僧卷军求枯骸出城，日数十载不能尽。”直到康熙初年，四川巡抚张德地由广元入蜀赴任，“沿途瞻望，举目荆榛，一二孑遗，鹑衣菜色。”抵达成都后，见到成都仍处于“荒烟蔓草之中”。康熙十年(1671年)，四川仍是“有可耕之田，无耕田之民”。

为此，清朝统治者亟待制定对策，以解决四川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。当时有各种办法可供选择：驻兵屯垦，这在元朝医治成都平原荒残时就用过，效果不错，但在清初却行不通；把战乱中流落在外的四川土著强制解送回原籍，但所招人数又与实际的需要相差很远。真正有效的措施，还是来自民间。张德地“访问乡老，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”，常“迁移外省人民填实地方”。据此，他提出扩大招垦范围，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落籍耕种的建议。其后，清廷根据张德地的建议，针对四川的特殊情况，制定出一套大力鼓

励外省入川落籍的移民政策。

与同期清政府在台湾实行的局部的、间断的移民政策相对照，在四川则是实行的全方位的积极的开放政策。在这个开放的特区里，清政府既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民携家自愿入川，又以升官为手段大力倡导官员招民入川，甚至连外省游手好闲之人，四川也乐意筹措盘缠费用接其入境。不仅如此，这一政策还保持连续不断，稳定不变，直至乾隆之世，仍然照样执行。当时，省内外一些官员对这一政策不理解，屡次奏请设法限制移民，乾隆帝还为此训斥他们说：“此所谓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也。”话没说明，实际是因为四川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，对内地和西南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局和利益，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比台湾更宽松实际的移民政策。正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之下，四川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全面敞开了引进劳动力的大门，由此也就形成了清初近百年的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。

# 扯响簧



扯响簧

### 三、滚滚移民潮

本世纪80年代以来，以四川为源头的民工潮汹涌澎湃，一批又一批的四川民工，奔向广东等沿海经济特区。这种情形，多少有点类似二三百年前历史上那场“湖广填四川”运动。所不同的是，前者是去打工，而后者却是移民。但动机都是一致的，即都是想到当时的经济特区去寻求经济上的富裕和发展。

清初四川的移民运动，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，移民的入川动机、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例如，在秦汉和唐末五代之际，由于关中和中原战乱不已，四川安定繁荣，外省有不少人逃入四川，其动机纯粹只是为了解决暂时的饥荒，或寻求躲避战乱，初衷并不一定要在四川定居。即或有外省移民迁入，也多带有政治因素和强迫性质。而在清初，由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和岭南各省，自明代以来经济迅速发展，商品经济水平均较四川为高，因而人民的商品经济观念和求富发迹的心理普遍较强。当清初四川亟待外来劳动力进行开发的时候，正好为他们入川致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遇。这次移民运动中，虽然不乏身无分文的流浪者，但其主流则是一些在原籍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户。他们移民四川纯属经济原因，自愿行